

佛教史觀與多元「中國」 ——評柯嘉豪《佛教史學在中國》

Buddhist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the Plural “China”:
Review of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by John Kieschnick

孔令偉 (Kung Ling-Wei) *

一、引言：佛教與中國史學的交會點

如許理和 (Erik Zürcher, 1928-2008) 在《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一書中所指出，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與中國本土傳統，雙方在歷史時期產生廣泛而深刻之互動與交流。換句話說，佛教信仰在中國社會普遍流傳的過程中，中國文化亦對佛教傳統本身造成關鍵性之影響。¹ 那麼佛教與中國之間究竟具體經由哪些層面，又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產生互動？在這類問題意識之下，研究漢傳佛教史的學者，業已紛紛就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思想等不同層面，來探討佛教與中國之關係，而柯嘉豪 (John Kieschnick) 近期出版之《佛教史學在中國》(*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正是此一學術領域當中的力作。² 《佛教史學在中國》係於 2022 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印行，列入該社聖嚴漢傳佛教叢書，該系列收錄國際漢學界中關於漢傳佛教之佳作，其中多有膾炙人口者，如于君方

《漢傳佛教復興：雲棲祿宏及明末融合》(*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Zhuho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 四十週年再版。³ 至於《佛教史學在中國》一書亦屬近年來漢傳佛教研究中之佼佼者，出版後翌年旋即獲得 2023 年沼田智秀佛教學術專書獎 (Toshihide Numata Book Award in Buddhism)，足見學界同行對其之肯定。

本書作者柯嘉豪，現任美國史丹佛大學宗教學系何鴻毅佛教研究講座教授 (Robert H. N. Ho Family Foundation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其著作等身，質量均佳，享譽國際學林，係當代學界研究漢傳佛教史之代表學者之一。其長期從傳記書寫以及物質文化等面向，關注佛教傳統與中土文化之互動，並有相關專著問世，如《高僧：中古中國聖者傳中的佛教理想》(*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等，皆為其代表之作。⁴ 此外尚值得一提的是，柯氏的學術經歷

*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1 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Brill, 2007).

2 John Kieschnick,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3 Chün-fang Yü,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Zhuho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4 John Kieschnick, *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John Kieschnick,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與臺灣學界頗有淵源，在前往英美學界任教以前，柯嘉豪曾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除了歐美宗教研究所見長的問題意識以及比較觀點之外，柯嘉豪之著作往往亦體現其紮實之漢文史料基礎。其多元之學術背景，使得他在歐美宗教學脈絡下的佛教研究之外，亦獲得華文歷史學界之高度認可。其通貫東西國際學界，乃至溝通歷史學與宗教學等跨學科之多元視野，卓然有成，為學林所重。

《佛教史學在中國》一書，主要從多元視野研究身處中國的僧人與居士等不同身分之佛教徒如何、為何書寫歷史，進而探討佛教歷史書寫之關鍵意義。長久以來，學術界、宗教界乃至一般普羅大眾往往對佛教文化有某種先入為主的印象，認為以輪迴為核心的循環時間觀念，使得佛教徒重視抽象的義理而看輕具體的史事，甚至以此推衍解釋為何印度文明雖歷史悠久，所留下的史學著作數量卻相當稀少。跳脫出上述這種既有的刻板印象，柯嘉豪通過爬梳《高僧傳》、《景德傳燈錄》等內容豐富的漢傳佛教史籍，為讀者展現漢傳佛教徒如何通過歷史書寫來體現、重塑自身的宗教認同，而中國的歷史書寫傳統又是如何與佛教義理、文本乃至組織之間產生互動，從而形成一種獨特的中國佛教歷史書寫傳統；這種佛教傳統下的歷史書寫，與中國官方所推動的正史編纂，即作者所謂朝廷史學（court history），二者間既有競爭張力，亦有借鑒互動。

二、時間性與歷史書寫：授記與系譜的史觀

本書由導論、六章主體與結語構成，其中六個章節分別題為「天竺」（India）、「史源」（sources）、「業力」（Karma）、「授記」（prophecy）、「系譜」（genealogy）、「現代性」（modernity），整體呈現出一種以概念主題為中心、兼顧時間演進的結構，依照作者設計依序探討印度佛教史觀的起源性地位、佛教史料與史學技藝、佛教教義與歷史因果、預言與歷史意圖、宗派正統性建構，乃至二十世紀以降佛教史的轉型等中國佛教史學史之關鍵議題。這種章節設計並非一般通行之朝代史敘述，而是強調佛教歷史書寫的主題性面向。每一章節自漢晉以降，貫穿中古至近現代，展現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

視野，並於結尾提供附錄，包括重要史籍編年與宗派系譜，方便讀者掌握整體架構。

第一章「天竺」討論佛教的印度起源對於中國佛教史家的關鍵意義，有別於奉儒家思想為圭臬的中國正史書寫。第二章「史源」探究中國佛教史家如何處理文獻記載中的差異以廓清史源，並指出佛教信仰對其歷史考究之影響。第三章「業力」分析佛教中的業力因果觀念，如何成為中國佛教史家用以解釋歷史發展的思想導引。第四章「授記」則考察預言在佛教史書寫中的特殊作用。第五章「系譜」則討論燈錄一類宗譜傳承記載的興起對於祖師傳承乃至歷史記憶的建構。第六章「現代性」則聚焦二十世紀上半葉現代歷史學發展對於佛教史書寫的影響，尤其是中國佛教徒對近代歐美學界實證史學之接觸、容受及反思。在章節正文之後，作者表列出二十世紀以前主要的中國佛教史學著作，以及印度至中國佛教的傳承宗師系譜，用以作為參考附錄，有助於讀者進一步熟悉中國佛教史的基本背景。

三、佛教史學的敘事宗教性與詮釋能動性

本書各章起於漢晉，迄於民國，行文架構雖有一定的時序性，但相比一般歷史學著作，則更加傾向依概念主題編排，這點體現作者對佛教史學的分類巧思。作者以「時間」（time）、「教義」（doctrine）、「意圖」（agenda）與「技藝」（craft）等四點概念框架，作為貫穿全書的分析單位。首先，在時間方面，本書著重於授記與系譜等書寫手法如何重構歷史時間，顯示佛教徒如何以「過去預言—未來實現」的架構進行歷史理解，挑戰朝廷史學以年號與帝系為中心的編年觀。其次，就教義而言，如其第三章所展現，佛教的業力、功德與因果邏輯，成為解釋歷史發展與人物興衰的詮釋基礎，與儒家道德因果論形成對照。此外，從意圖來說，佛教歷史書寫常內含宗派競爭、護教論述，或對統治者的勸誡意圖，特別在第五與第六章展現，歷史敘述成為建構正統與形塑政治倫理的重要工具。最後，關於書寫技藝（craft），作者強調佛教史家如何結合中國傳統的考據精神與佛教義理，在證據不足或矛盾時，以義理作為推理依據，體現佛教文獻詮釋的特色。

通過考察中國佛教史書寫中的授記與系譜等特殊寫作類型，本書深入探討中國佛教作者對時間性（temporality）的理解，並指出佛教傳統對中國歷史書寫文類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第四、五章。此外，本書亦從佛教教義的內在理路，指出中國佛教史書寫者將功德與因果等觀念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對此作者在第三章中有詳盡的探討。另一方面，本書亦重視現實意圖對於中國佛教史書寫的推進，如佛教史的道德教訓功能被用以作為感化、鼓勵統治者、社會菁英護持佛教的重要依據，在此脈絡之下，書寫佛教史也成為不同宗派競爭正統性的權力場域。換言之，中國的佛教史書寫並不單純是在宗教界內部發揮作用，同時亦對以朝廷、士族為核心的政治與社會集團造成深遠影響。至於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學者，在寫作佛教史的同時，亦試圖藉此思考佛教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處境。至於在歷史書寫技藝的方面，本書指出中國佛教史家誠然受到中國史學文獻考辨傳統的影響，但與此同時佛教義理亦在他們的歷史寫作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尤其在文獻考異或史不足徵的情況下，佛教史家往往以佛教義理作為筆削獨斷的論理依據。

四、比較視野下的中國佛教史觀

除了深入分析中國佛教徒如何書寫歷史、建構宗派記憶與宗教身分外，《佛教史學在中國》一書亦展現出一定程度的跨文化比較視野，尤其在導論與結語之中。作者在導論指出，藏文佛教史學中亦存在與漢傳佛教相似的史書傳統，其中尤以十七世紀覺囊派高僧多羅那他（Tāranātha, 1575-1634）所著之《印度佛教史》（藏 *Rgya gar chos' byung*）為代表，該書與中國佛教史書在史源鑑別、宗派系譜、教法興衰等面向上展現出一定程度的共同關懷，突顯藏漢佛教徒在歷史思維與書寫技藝上的比較意義（頁 11-12）。此外，在第一章中，柯嘉豪則從另一角度揭示中國佛教徒如何在史學建構中重新定位印度佛教的地位。作者指出，儘管印度佛教原初的敘事傳統並不以朝代編年為主軸，中國佛教徒卻試圖以中國式史學思維，如朝代次第、人物列傳等體例，重構佛教起源與傳播的歷史圖景，此種過程實為一種跨文化的重構史觀，顯示佛教史學如何在地域轉移中產生結構與內容的再造。至於結語，作者更進一步將中國佛教史學放

入全球宗教史學的比較框架之中，指出其既非單純承襲印度的佛教敘事模式，亦不同於中國儒家官修史學，而是一種文化交流創造下的產物。雖然書中並未展開關於印藏佛教與漢傳佛教史學史的實質比較，但已為後續跨宗教與跨文化佛教史學的對話奠定了問題意識。由此可見，《佛教史學在中國》不僅從內在義理、時間觀、敘事技藝等層面檢視中國佛教史學的建構邏輯，同時亦試圖與其他佛教文化與宗教史傳統對話，為理解佛教史學的多元性與跨域流動提供了重要啟發。

綜觀本書，史料堅實、概念清晰且行文流暢，在結合漢傳佛教研究與中國史學史的先行研究基礎上，從長時段的通史視野為讀者勾勒出中國佛教史學史的宏觀圖像，同時又能通過具體案例仔細分析具體佛教史書之歷史意義，實為通貫佛學與史學，且兼具宏觀與微觀的難得傑作。長久以來，佛教研究每以義理思辨為宗，用資解脫之道；或云歷史考據為末流，難窺內家究竟。本書則跳脫過往義理、考據的二分窠臼，從通貫的史學史觀點切入漢傳佛教史的源流與發展，並且彰顯中國史學傳統與印度佛教思想相互發明之處，尤其突顯中國佛教史觀中的宗教意涵。作者一方面強調佛教徒如何書寫歷史以形塑宗教身分，另一方面亦反思佛教與中國史學傳統的互動與互構，如《高僧傳》對應《史記列傳》，《傳燈錄》借鑑家譜編纂，顯示佛教史觀並非中國史學之他者，而是參與者及共構者。本書也強調佛教徒的史學實踐常突破儒家正史的框架，例如以因果報應取代天命循環，以授記預言取代史官筆法，展現佛教特有的歷史詮釋論述。這種宗教史觀，突顯了佛教作為另類史學傳統的正當性與生產力。

不僅如此，本書向讀者所展現的研究視野，或亦足為進一步反思何為「中國」的歷史議題，提供關鍵思想參考。不同於以往書寫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傾向以朝廷史官所主導的正史為焦點，本書從漢傳佛教徒的角度出發為學界揭示中國史學傳統的多元性與開放性。更具體的來說，中國史學傳統不僅包含《春秋》、《史記》、《資治通鑑》等經典著作中的儒家思想，同時隨著魏晉以降佛教文化傳入中土孕育出《高僧傳》、《續高僧傳》、《開元釋教錄》等佛教史學著作。至近代歐美實證史學、語文學等學科傳入中國，在啟發傅斯年、陳寅恪等中國史學者的同時，亦刺激太虛、印順等僧人重新書寫中國佛教史。

換句話說，中國史學史的本質，不僅有官方、儒家、經驗等層面，同時亦有個人、佛教、先驗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如本書所展示的，漢傳佛教徒的歷史書寫在容受中國傳統史學的同時，亦將佛教特色的歷史書寫文類引入中國，其中源於佛教燈史一類的系譜書寫即為例證。

五、結語：佛教史學與「中國」概念的再思考

本書體大思精，發人深省，惟就「中國」概念的多元性而言，本書的概念定義與背後意涵，或許值得讀者進一步追問探究。本書英文原題《佛教史學在中國》（*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然而實際上作者的研究對象聚焦於慧皎（497-554）等漢傳佛教徒。需要注意的是，作為地理概念與文化意義上的「中國」（China）在不同歷史時期其範圍具有顯著的變化與差異，與漢傳佛教徒主要活躍的「中原」（China proper）在概念定義上雖有重合，範圍卻遠較其更加複雜多元。佛教文化在中國的發展，並非只有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大理佛教等多元佛教傳統，亦不可忽視。如作者柯嘉豪也曾在本書導論中徵引先行研究，將十七世紀西藏覺囊派僧人多羅那他所著藏文《印度佛教史》與其他漢文佛教史書進行比較（見該書頁11）。然通覽本書，可知其各章研究範圍實際上聚焦於「漢傳佛教史學在中原」；至於「佛教史學在中國」此一宏大題目，則有待不同領域的佛教史、語文學、古文字學研究者攜手合作推進。以傳世及出土文獻論，藏文佛教文獻浩如煙海，此外尚有吐火羅、粟特、回鶻、西夏、蒙古以及滿洲語文的佛教文獻，皆反映不同時期多元佛教文化在中國與內陸亞洲（Inner Asia）的流傳。特就佛教史學史在中國的發展而言，十三至十八世紀涵蓋元明清三代，實乃關鍵之歷史轉折期，然而卻是本書著墨最少的時段，這點或許也體現漢傳佛教領域

之先行研究側重唐宋與近現代的時段趨向。

蒙元以降「中國」範圍的複雜化，使得在關注漢傳佛教文獻的同時，實有關注藏、蒙、滿等多語種佛教史書之必要，其中陳寅恪（1890-1969）〈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即為此一學術理路下的經典之作，指出蒙元帝師八思巴·羅卓堅參（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所造藏文〈彰所知論〉所建構之印藏蒙同源論，實開清代《蒙古源流》等佛教史寫作框架之濫觴。⁵這類運用多語種文獻探討佛教史學史與「中國」概念形成的研究，仍有待學界未來繼續推進。承前所述，所謂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其佛教傳統遠較漢傳佛教更為豐富廣大，尤其是考慮公元八世紀以後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二者間的往來，加上佛教自印度傳入南詔形成具有西南當地特色之佛教文化。在青藏與雲貴高原之外，佛教在北亞草原亦產生廣泛影響，諸如鮮卑、突厥、回鶻乃至蒙古等游牧文明皆先後形成深厚的佛教文化傳統。隨著十三世紀蒙元帝國的擴張，「中國」的地理範圍與文化內涵皆產生顯著變化，就佛教社群而言，蒙元統治下漢地、西藏、蒙古佛教徒之間的互動愈趨密切，其過程中河西西夏僧人曾作為中間人發揮關鍵作用。⁶至十六世紀後期藏傳佛教再次弘傳蒙古高原，並經由蒙古人間接影響遼東的女真／滿洲人，此後藏傳佛教的「政教二道」思想遂成為滿洲人建國的政權合法性基礎，並隨著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對「中國」概念的形成造成深遠影響。⁷直至二十世紀前期，藏傳佛教更曾對現代「中國」的形成，造成舉足輕重的影響。⁸要言之，十三世紀以降「中國」概念的形成，不僅有中原漢傳佛教徒的參與，同時西藏、蒙古、滿洲等內亞佛教徒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視。從政教關係與國家建構的角度來說，不僅僅是「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同時也是「佛教造就中國」（Buddhism in the making of China）。

5 陳寅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1931），頁302-309。

6 沈衛榮，〈文本對勘與歷史建構：藏傳佛教於西域和中原傳播歷史研究導論〉，《文史》，2013.4，頁43-91。

7 烏雲畢力格、孔令偉，〈論「五色四藩」的來源及其內涵〉，《民族研究》2016.2，頁85-97；Johan Elverskog,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8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